

战前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中国性”与“华人性”问题 ——以印马越泰为例^{*}

谢侃侃

【摘 要】一些研究者常常把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与中国及华人群体对该地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但“中国向东南亚输出早期共产主义”的简单论断是存在严重谬误的。在有关东南亚早期共运的讨论中，种族问题极具争议，突出表现为海外华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扮演了多样且矛盾的角色。本文以多层次的“中国性”为切入点，探讨早期东南亚共运的复杂性，其中既包括中国革命对东南亚革命者的思想启发，也包括华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本研究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作为基本的参考坐标，就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以及从未被欧洲殖民的泰国进行对比。本文不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行文，也无意对上述地区逐个展开分析，而是着重探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相似的反帝斗争路线；（2）东南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借鉴与变通；（3）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国际共运；东南亚；中国性；华人性；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D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6099 (2019) 06 - 0130 - 22

【作者简介】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人才启动项目“印尼殖民晚期的左翼民族解放运动”。

^{*} 本文的早期英文版本曾向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2017 年 9 月举办的“Transnational Leftism: The Comintern and the National, Colonial and Racial Questions”工作坊提交，并收录于会议论文集，由加拿大出版社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笔者已从该出版社获得中文版翻译和发表许可。笔者感谢 Peter Zinoman、Oleksa Drachewych、咸蔓雪、金勇等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引言

一些研究者常常把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与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及当地华人群体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在华人人口比例较高的马来亚、泰国等地区尤为盛行；越南等国长期在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方面受到中国影响，其革命与中国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东南亚华人参与的早期国际共运与中国国民党及共产党在当地的活动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向东南亚输出早期共产主义”的简单论断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海外华人确实在东南亚的反帝反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左翼思想的传播及国际共运在该地区的兴起也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欧洲殖民宗主国的政治运动、一战及大萧条带来的世界秩序改变、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以及民族意识在整个殖民世界的觉醒等等。

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领导并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共产主义运动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并采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与当时盛行的其他政治运动形成了显著的区别。然而，学者们却常常诟病共产国际所领导的革命实践，认为该组织缺乏对各地情况的深入理解，未能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和物质支持。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相似的社会政治环境，亚洲各国的早期共运存在许多共同特征，但受制于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各地对意识形态和斗争策略的解读非常多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应用及各地革命者采取的斗争方式也千差万别。关于东南亚早期国际共运的论争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主导的反帝反殖斗争中的作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宗教势力强大的殖民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占少数的工人阶级与占多数的农民阶级间的合作关系等等。在此类议题中，种族问题是极具争议的，突出表现为海外华人群体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扮演了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具有较强政治意识的中国移民热衷于把中国的革命经验介绍到东南亚，鼓励当地人民与欧洲人进行对抗并争取合理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哈利·本达（Harry Benda）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级”的概念在东南亚殖民社会的本地居民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从事零售的华人店主和放高利贷者在本地人眼中常常被视为外来剥削者而非政治盟友。因此，在本地人激进的反抗中，成为打击目标的往往是华人移民，而非“遥远的欧洲大资本家或官员”^①。

^① Harry Benda,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Harry Benda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72, pp. 51–52.

本文以多层面的“中国性”(Chineseness,在不同语境下,亦译作“华人性”)为切入点,探讨早期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性,其中既包括中国革命对东南亚革命者的思想启发,也包括华人在其中所扮演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角色。本研究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作为基本的参考坐标,对比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法属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和英属马来亚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此外,泰国虽然从未经历过正式的欧洲殖民统治,但基于其革命所具有的代表性与特殊性,笔者仍将其与上述三个殖民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不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行文,也无意对单个地区进行细节分析,而是着重探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相似的反帝斗争路线;(2)东南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借鉴与变通;(3)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一 解构“中国性”

“中国”是一个较为明确的政治和地理概念,但“中国性”却存在多重意涵^①。华裔学者洪美恩(Ien Ang)认为,“离散范式”(diasporic paradigm)的出现增加了“中国性”研究的难度。许多研究海外华人的学者指出,“中国”概念超越了文化和地理边界,在本体论上并非一个稳定的研究对象。相对应地,“中国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开放且模糊的标记物”(open and indeterminate signifier),其意义取决于对不同地区海外华人不断的研究与讨论^②。尽管本文关注的四个国家(地区)经历了较为相似的华人移民浪潮,但东南亚华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参与政治斗争的方式却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华人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例如马来群岛的“土生华人”或“海峡华人”(Peranakan),相比新客及旅居者(sojourner)更多地投身于地方政治。但需要注意的是,“土生”、“新客”与“旅居”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清晰的群体和代际界线。殖民晚期的东南亚社会政治局势错综复杂,不同华人群体也经历了复杂的身份变化:少数华人精英接受了欧洲教育,积极地参与殖民地政治,成为殖民统治的支持者和受益人;一批华人知识分子受本地民族主义运动影响,追随本地人的反殖独立运

^①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Vol. 23, No. 2, 1996, p. 111.

^② Ien Ang,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ic Paradigm", *Boundary 2*, Vol. 25, No. 3, 1998, p. 225.

动,主张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另有相当数量的华人群体继续保持着跟中国的紧密联系,关心中国政治,追随中国革命,对中国的认同感日益增强^①。针对第三个群体,陈奕麟(Allen Chun)认为“一部分‘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向‘华侨’(overseas Chinese)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的一次扩张,它试图通过国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教育推动华人群体身份的改变,让他们从曾经分裂的、以宗亲关系为中心的方言群体变成一个全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没有切断与祖国联系的华侨来说,这种新的认同感可以被看作是原生中国性的发展;对于那些文化生活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同化或与当地融合的人来说,这种新身份带来的则是异化。”^②

从政治角度来看,离散范式具有其局限性。孔飞力(Philip Kuhn)指出,除了关注海外华人本身,还需要研究华人生活环境中的“他者”群体^③。中国与东南亚及东南亚各地间的距离较近,信息交流频繁,各种纵横交错的网络使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复杂。不可否认,中国对华人离散群体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不仅限于华社。东南亚本地的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命运时常会参考“中国经验”。同样地,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可以从不同渠道接触到各种非西方观点。虽然“中国”在学者们关于亚洲的讨论中长期占据中心位置,但一味地采用简单的“中心—边缘”框架来分析问题,把东南亚地区视作中国影响力的被动接受者是严重错误的。无论这种影响力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存在,东南亚都绝非中国的政治边缘——两次世界大战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同时兴起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

杜维明在《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中批判了把中国大陆始终置于中华文化中心的本质主义观点^④。他认为,随着大量华人离开故土、移民海外,他们的定居地成为具有新“中国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中国”概念包含三个世界:(1)华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如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2)海外华人群体;(3)超越国界和话语体系,对广义的大中华地区抱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群体。虽然杜维明的理论主要针对当代问

^① 关于这一时期海外华人三大类政治倾向的论述,参见 Leo Suryadinata,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 1917-42*,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Vol. 23, No. 2, 1996, p. 124.

^③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 4.

^④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Daedalus*, Vol. 120, No. 2, 1991, pp. 1-32.

题,但这种框架对分析两次世界大战间“中国性”在东南亚动荡的政治生态中所发挥的多层次且充满争议的作用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因此,要理解亚洲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需要讨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即(1)中国和东南亚在地缘政治上的相互影响;(2)海外华人所扮演的矛盾角色;(3)东南亚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将共产主义与当地带有排外色彩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及宗教传统相结合。

二 抗击帝国主义:以中国为参照

根据马克思主义古典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工人阶级才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因次,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爆发于高度工业化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尽管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因其内部无可调和的矛盾逐步走向崩溃,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初似乎变得更加繁荣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趋向稳固,海外殖民掠夺间接提高了欧洲工人的福利,大大缓和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许多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不再试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殖民统治,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积极参与既有民主政治制度上。他们宣称这是为了服务欧洲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并以“殖民具有文明开化作用”为借口替殖民统治进行辩护^①。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已借助帝国主义扩张延伸到了世界各欠发达地区,但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仍倾向于优先代表欧洲工人阶级而非被剥削殖民地的利益,殖民地问题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话语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革命^②。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在欠发达的东方殖民和半殖民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旨在协调并推动世界各地的国际共运,反抗西方帝国主义。

关于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学术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及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主题:(1)亚洲共产主义革命是共产国际在全球范围内领导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地原有的激进运动是如

^① 关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殖民主义态度的分析,可参考鲁斯·麦克维(Ruth McVey)对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Dutch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SDAP)领袖范·科尔(H. van Kol)的研究: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

^②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p. 1-4.

何相互融合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恰逢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各种进步思潮在其中百花齐放，旨在把中国从落后的封建传统中解救出来。帝国主义势力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让给日本，新文化运动逐步走向高潮，最终发展成为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五四运动。一方面，西方现代性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充满了吸引力；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扩张力度却不断增强，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产生了十分矛盾的心理。在此背景下，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也因此被高度政治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关系是辩证（dialectical）而非演进的（evolutionary）^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尚浅，“创立共产党的激进派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理解为一种革命和社会理论，极少有人坚定地将其视作一种政治意识形态。”^②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颇为盛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其成立标志着中国激进派在1921年正式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其斗争纲领。德里克指出，马列身份的确立意味着对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进行压制——1921年至1927年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几乎全部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源头，很少有人对欧洲马克思主义经典感兴趣。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思想中找到了一种作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并迅速将其投入于革命实践。”^③

本达指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④，意识形态间的边界在中共兴起之初也是相对模糊的。在中共成立前，一个基于思想及个人网络、汇聚国民党内左翼人士的联盟已经存在，该网络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亚洲其他地区推动共产主义革命时也经常倡导这种形式的合作。另外，无产阶级在城市的迅速壮大使得左翼知识分子能够推动他们的革命计划。与原来只能通过加入官僚机构去参与政治的传统模式不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从外部影响政治——通过与工人阶级进行合作，左翼知识分子看到了用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

尽管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中国与欧洲人统治下的亚洲

^①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0 - 11.

^②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 255.

^③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269 - 270.

^④ Harry Benda,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Harry Benda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72, p. 261.

殖民地一样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新兴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要么不存在，要么势单力薄，无法通过动员以农民为主的广大群众对殖民政权进行有效的反抗^①。共产主义运动由左翼知识分子领导，城市无产阶级参与，除了寻求与农民进行密切合作别无选择。中国虽沦为半殖民地，但并不与帝国主义进行直接对抗；与中国不同，东南亚的殖民社会则完全由欧洲列强控制。因此，正如黄金庆（Huỳnh Kim Khánh）在其关于越南的著作中所言，当时共产党人的最佳斗争方式是找到反殖民主义、受原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影响的爱国运动，以及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结合点^②。尽管共产主义通常在其理论意义上被认为是“国际的”而非“国家的”，但其在本土化实践中常常与当地固有的社会体系相结合，成为一种“民间共产主义”（folk communism）。一方面，本土革命者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现代化的无政府主义”（modernized anarchism），通过发挥类似于宗教的作用来吸引大众^③。另一方面，国际化的共产主义为各地反帝运动提供了两个有用的工具：一是智识上的，即通过共产主义将当地的反殖民斗争纳入到全球性的革命网络中；第二点则是心理上的，即通过共产主义让本地人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争取与欧洲人平等的权利^④。

与中国类似，越南是一个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超过90%）的单一民族社会。越南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ethnic self-awareness），其民族统一性在殖民时代前便已确立。黄金庆认为，越南反殖斗争的主要基础是固有的爱国传统（patriotic traditions），而非国族意识（national awareness）的觉醒。爱国传统强调传统的越南社会秩序，如祖先崇拜和群体意识。这种传统以宗亲关系为导向，具有丰富的感情内涵，相对来说更具内向性。相比之下，官方建构的民族主义则更关注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只存在于精英的政治话语中。由于爱国传统在越南社会中根深蒂固，当地的反殖斗争可以被轻易地解读为爱国行动，反之亦然。在越南与法国殖民者的对抗中，政治倾向各异的本土精英往往可以利用这种爱国传统去动员群众，以实现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目标。相对应地，这种爱国主义在共产党人领导的激进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⑤。

① 由城市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确实是在后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战前国际共运的兴起，在此暂不对此类运动进行详细讨论。

②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3.

③ Harry Benda, "Reflections on Asian Communism",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66, pp. 259 - 260.

④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p. 55.

⑤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pp. 27 - 32.

相比之下，印尼是多元社会，国族意识及民族统一性在前殖民时代均不存在，这使得当地的激进运动植根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印尼缺乏一个具有统领性的、可以有效团结各界群众的意识形态，其抗击荷兰帝国主义的斗争主要来自三股势力：（1）由与中东关系密切的穆斯林学者领导的泛伊斯兰运动；（2）由世俗化知识分子领导的以自治为目的的早期民族主义运动；（3）由华人移民引入的“中国革命”^①。中国及越南的革命活动通常有着相对直接的政治目的，但20世纪初印尼精英建立的社团却多为社会文化组织而非政党^②。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的前身荷印社会民主协会（Indische Sociaal-De-mocratische Vereeniging, ISDA）是亚洲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由荷兰人马林（Henk Sneevliet）于1914年创立。协会从创始之初就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与当时的早期民族主义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麦克维指出，萌芽阶段的民族主义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并且这些人在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时缺乏坚定性^③。相比之下，泛伊斯兰运动在当地拥有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 SI）是印尼代表伊斯兰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组织，在当时拥有最广大的群众网络。在此背景下，一些印尼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伊斯兰联盟，促成了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这种所谓“集团内括”（bloc within）的合作模式后被共产国际认可，在世界各地进行推广，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亦是这种策略的体现^④。

个别族群在东南亚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占有极高的比例，这一现象在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等地尤其明显，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员多为中国或越南移民^⑤。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移民群体祖籍地的共运出现较早且取得了一定成就；其次，相比生活安定的原住民，移民群体更容易受到政治动员的影响。左翼政治运动高举反帝旗帜，不仅与移民在殖民地追求平等的诉求一致，还

^① “中国革命运动”（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的提法来自列宁于1913年出版的《亚洲的觉醒》，其中所指的“中国革命”是1911年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影响印尼的“中国革命”有着更为丰富的意涵。参见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

^②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22.

^③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64.

^④ “集团内括”是笔者的翻译，在中文语境中没有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方式。印尼共产党创始人马林在共产国际推广“集团内括”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在中国推进国共合作的策略又被称为“斯内福利特策略”，但适用范围有限，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讨论。

^⑤ 参见 Christopher E. Goscha, *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1885-1954*,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64-96; Anna Belogurova,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of Nationalit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minter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1923-1939”,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9, No. 3, 2014, p. 447.

与移民原籍地正在进行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运动相呼应，因而这些运动对移民中的无产阶级极具吸引力^①。然而，这类运动对原住民的吸引力则相对较弱，主要原因是左翼组织成员多为移民，原住民很难对其思想理论和斗争目标产生共鸣。虽然共运所高举的国际主义旗帜对解决殖民地问题是有益的，但它也容易因其“舶来品”属性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冲击，后文将对这一现象进行具体讨论。

三 对中国革命的借鉴与变通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为世界共运提供支持 with 指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向东看”战略，支持中国革命，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共产国际对中国共运的贡献存在争议，但对国际共运中的所谓“中国模式”一度非常认可，也较为积极地将中国革命经验推广到世界各地的被殖民地区。由于中国与东南亚距离较近，各方面联系密切，包括共运在内的中国革命对东南亚有着深刻的影响，本节从三个主要角度对此进行探讨：（1）革命经验的可移植性；（2）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的策源地；（3）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南亚早期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1. 革命经验的可移植性

彼时的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东南亚知识分子来说，找到中国革命与他们所处环境的相关性并不困难。在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国际共运出现以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极大鼓舞了戴着殖民枷锁的亚洲人民。孙中山政治思想以“民族”、“民权”和“民生”为核心，在寻求“师与术”（teachers and techniques）的东南亚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②。

然而，“三民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不意味政治思想仅从中国传向东南亚。印尼共产党的前身是荷印社会民主协会（ISDA），其建立早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尽管印尼共产党人与彼时欧洲共运的接触有限，但他们较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殖民地实际相结合，并试图广泛地从各个族群吸纳会员。在其

^① 虽然泰国从来没有沦为正式的殖民地，但它在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对抗中和邻近地区有很多共同点。参考 Winichakul Thongchai,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2009; Tamara Loos, *Subject Siam: Family, Law,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ailan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6, 53.

关键的荷兰籍创始人被逐出境后，社会民主协会在本地精英的领导下经历了较为平稳的过渡，逐渐从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团体发展为一个成熟且得到官方承认的合法政党^①。为了在殖民政权的严密监控下生存下来，印尼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伊斯兰联盟，但仍然保留了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列宁呼吁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建立合作关系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印尼共产党所采取的“集团内括”策略与列宁的方针是一致的。被荷兰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后，社会民主协会的荷兰籍创始人马林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早的代表之一，积极地向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介绍“集团内括”策略，最终促成了1923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间的第一次合作^②。讽刺的是，当“集团内括”策略在中国取得暂时成功的时候，共产国际坚持认为印尼共产党必须采用国共模式，继续维持与伊斯兰联盟的合作关系，全然不顾印尼时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国共合作的情况不同，伊斯兰联盟因其内部矛盾势力渐弱，印尼共产党已逐渐在统一战线中占据上风。这意味着印尼共产党掌握了印尼革命的主导权，而不仅仅是参与其中的机会。虽然共产国际的态度与当时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密不可分，但它对“集团内括”策略和所谓“中国革命经验”教条式的坚持反映出该组织成员对印尼情况尚缺乏深入的了解^③。

然而，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看，国共合作对东南亚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1924年写道“毫无疑问，尽管孙中山在面对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及其煽动者英美法帝国主义时仅取得了部分胜利，但这种胜利将国民党在殖民地人民眼中的权威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太平洋沿岸的解放运动注入一针强心剂。”^④1925年至1926年间，国共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北伐，对西方支持的军阀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人们对中国革命模式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国革命也逐渐成为许多东南亚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⑤。麦克维指出，印尼共产党利用发生在

^① 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尼共产主义组织的态度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在承认该党合法性的同时，殖民政府也对共产主义活动进行了严密监视。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经常遭到逮捕、调查或驱逐出境。参见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xii.

^②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E. J. Brill, 1991, pp. 12-25.

^③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83.

^④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224.

^⑤ 北伐战争于1926年7月正式开始。虽然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孙中山去世后已经对国共合作产生怀疑，国共统一战线直到1927年才彻底解体。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最终使得中国在1928年完成了统一。有关东南亚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参见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350.

中国的政治运动来证明革命不再只存在于遥远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们均觊觎中国，但如果中国的反帝斗争能够取得成功，革命在印尼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因为相比之下荷兰人要弱小得多。”^①与之相对应，当1926年底国共合作受到质疑时，共产国际也用印尼革命为其中国政策辩护。1926年11月，印尼共产党在爪哇领导了一场失败的起义，共产国际很牵强地把这个发生在印尼的本土事件与中国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印尼的起义发生得恰逢其时，它无疑受到了最近中国革命的重大影响。这是广东军队（国民革命军）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增强印尼人民的信心……印尼革命必胜，中国革命必胜！”^②

2. 中国作为东南亚共运的策源地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中国很快成为共产国际在远东进行反帝斗争的重要堡垒。共产国际在中国部署了大量人员，并在广州和上海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不仅是中共与共产国际代表进行信息交流的据点，还成为海外革命重要的联络中心。早期东南亚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经常造访共产国际设在中国的机构，有的甚至长期在中国工作，建立了中国和东南亚革命间的紧密联系。中国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共运关键的战略策源地，其作用在印尼和越南共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马林是荷印社会民主协会的创始人，也是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共运间联系的第一人。他于1918年因煽动印尼工人反抗荷兰殖民政府被当局驱逐出境。马林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大会，并在之后被该组织派往中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并协调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1至1923年在中国逗留期间，马林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经常收到印尼共产党党报，他的文章也不时出现在《自由之语》（*Het Vrije Woord*）和《人民之声》（*Soeara Ra'jat*）等重要的印尼共产主义刊物上。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都会在上海会见马林。麦克维指出，中国和印尼共运之间的联系在马林任职上海期间达到了顶峰，这也使得印尼共产党不再孤立。丹·马六甲（Tan Malaka）是另一名重要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与马林类似，他在中国也停留了较长的

^①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29.

^② Semaun, "The Rebell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2 December 1926. 参考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350. 印尼共产党在其20世纪60年代的官方历史中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谈论了中国革命的影响。作者没有赞扬共产国际的政策，而是强调了印尼华人的作用“广东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以打击军阀为目的，这场革命通过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印尼华人对印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尼华人参与了印尼的革命与争取独立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华人在印尼早期共运中的影响比较有限，直到战后才较为积极地参与了印尼争取独立的革命。参见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 *Pemberontakan Nasional Pertama di Indonesia, 1926* [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民族起义（1926）], Djakarta: Jajasan Pembaruan, 1961, p. 47.

时间。在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的任命后，丹·马六甲于1923年12月抵达广州，主持共产国际劳工办事处的工作，并负责与东南亚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联络。作为港口城市的广州交通发达、通讯便利，丹·马六甲能够较为容易地向印尼共产党发送指令。1924年6月，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在广州召开，旨在太平洋沿岸地区推动工人运动，并增进各地间的联系。印尼共产党员阿里敏（Alimin）和布迪苏吉特罗（Budisutjitra）与丹·马六甲一起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参会。尽管共产国际最终于1925年关闭了其在广州开设的劳工办事处，但丹·马六甲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对远东劳工运动间的互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①。

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共产党在1924年至1925年间有两个重要的海外基地，分别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即印尼共产党前主席司马温（Semaun）领导的荷兰办事处和由丹·马六甲领导的广州办事处。两个办事处都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保持着联系，相互间却鲜有来往^②。然而，当荷兰共产党人提议关停广州办事处时，司马温却坚持认为与荷兰和广州的联系都至关重要。广州的重要性在于印尼有大量的华人，而印尼共产党需要借助这些人的影响^③。1926年初，荷兰殖民政府对印尼共运的压制愈加严酷，身在莫斯科的印尼共产党代表达索诺（Darsono）提议在中国进行印尼革命的组织工作“我们希望在国外的某处举行一次会议，地点最好选在中国……如果可以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联络中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如果同志们知道他们在海外还有领导，他们就会更加热情地投入革命，当前的局面也将得到显著改善。”^④

中国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作用在越南的早期共运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对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和提倡“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彻底失望后，旅居巴黎的胡志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成长为越南共运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⑤。胡志明于1924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目的是在越南发动两场革命：一场是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革命和一场旨在将土地归还给农民的社会革命。彼时，一群旅居中国南方的越南知识青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心心社”

^①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3 – 216.

^②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p. 214.

^③ “Report of Comrade Darsono to India Sub-Secretariat”, 6 May 1926, i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and Komintern (PKI), *Archief Komintern-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AKPKI, 共产国际与印尼共产党档案)*, Folder 2, ARCH0174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ISH), Amsterdam, Netherlands.

^④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Comrade Darsana’s Report”, 6 May 1926, in PKI, AKPKI, Folder 2, ARCH01744, IISH.

^⑤ Sophie Quinn-Judge, *Ho Chi Minh: The Missing Years: 1919 – 1941*,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42.

(Tâm Tâm Xã) 的组织,胡志明以该组织为基础,在广州创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Đoàn Thanh niên cộng sản Việt Nam)及其群众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Việt Nam Thanh Niên Cách Mạng Đồng Chí Hội 或 Thanh Niên)。1925年至1927年,广州的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是越南革命最为重要的据点,具有收留革命者、组织理论和实践培训、出版宣传和材料,以及策划地下活动等多重功能^①。青年革命同志会在两年内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共产主义组织——虽然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导致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广州总部遭到严重破坏,但该组织为越南共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黄金庆所言“1925年,甘地、孙中山、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等人的政治理论都已经被引入越南,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然而到1927年底,马列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有组织基础的主流政治思想。自此,共产主义一直都是越南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3.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活动

尽管国民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在国际舞台上却有着更加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通过推动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鼓励中共在国民党组织框架内展开工作。在莫斯科的支持下,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取得了胜利,并在1923年至1927年间将中国革命推向了高潮。然而,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共党员进行不遗余力的清剿,使共产党挣扎于生死存亡的边缘。鉴于二战前中国国内政局混乱,中共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而非国共统一战线中的一派)对东南亚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③。

相比之下,国民党继承了其前身同盟会的庞大海外网络,很早便在东南亚传播中国革命思想。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在1924年写道“国民党(一大后)党内重组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法属印度支那、美属菲律宾、荷属马来群岛、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度。在当年6月广州举行的太平洋运输工人大会上,几乎所有来自这些地区的代表都向国民党致敬——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将国民党的组织纲领及革命实践过分理想化了。”^④ 国民党力求依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宣

^①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4 - 68.

^②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p. 88.

^③ 关于1927年后共产党作为独立组织对东南亚的影响,参见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97, pp. 90 - 127.

^④ Voitinsk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truggle with Imperialism”, *Novyi Vostok*, No. 6, 1924, p. xxvi. 参考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24.

传策略赢得海外华人的支持，并通过华人群体对他们的聚居地进行渗透和影响。这种做法的实现基础是中国国籍法所遵循的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根据这一原则，中国父母的合法或法外子女，无论出生地，都自动被视作中国公民^①。因此，不仅东南亚的新客移民保留了中国国籍，出生于当地且拥有中国以外公民身份的华人也可以对其拥有中国国籍提出法律主张。在一些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印尼华人族群的迅速扩大与印尼共产党将中国革命视为其斗争范例存在密切的联系——印尼华人从国民党创始之初就积极追随中国革命，因此争取华人对印尼革命的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尚无将其“革命模式”进行对外输出的实力，却较为积极地在华人聚居且缺乏本土共运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海外组织，以求影响当地华人群体。马来亚和泰国的早期共运是反映这种情况的典型。1927年，中共在泰国和马来亚分别成立了面向当地华人的本地组织，将其命名为暹罗共产党及南洋共产党^③。在柬埔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则主要是中国人和越南人^④。虽然这些共产主义组织希望获取各族民众的广泛支持，但他们往往只在移民群体中拥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他们与非华人群体的接触中，这些组织所体现出的“华人性”似乎总是比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更为显著。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期间，胡志明就曾批评马来亚的共产党员们“脱离群众”，因为他们“无法吸引华人以外的种族加入”^⑤。

华人干部在招募党员时要面临很多实际困难，语言障碍只是其中之一，还有

① 清朝于1909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国籍法，但于1911年被推翻。此后的各政权原则上延续了1909年国籍法，且保留了血统原则。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一部新的国籍法，并在其中重申了血统原则，但该国籍法仍然与许多殖民地所遵循的出生地原则（*jus soli*）相冲突。就荷属东印度群岛而言，尽管中荷双方于1911年签署了关于限制中国领事司法管辖权的领事公约，但当地出生华人的公民身份依然较为模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印尼取得独立之后。参见 Donald E. Willmott, *The Nation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1900 - 1958*, Ithaca, N. 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1, pp. 30 - 33.

②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24.

③ 关于泰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参考 Tejapira Kasian,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 - 1958*,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 关于南洋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参考 Boon Kheng Cheah,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 - 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p. 14.

④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ambodia, 1930 - 197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 Christopher E. Goscha, *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1885 - 1954*,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pp. 83 - 88.

⑤ Boon Kheng Cheah,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 - 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p. 15.

许多困难植根于殖民地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及由此引发的深层社会经济矛盾^①。根据丹·马六甲对马来亚社会的观察，相比马来人，华人和城市中的商业活动有着更为频繁的接触，对当地的经济状况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②。此外，“华人”和“无产阶级”在当地人眼中通常是两个互不兼容的属性，这也使得由华人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对其他种族缺乏吸引力。

由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共党员进行清剿，许多共产党人在1927年后逃往东南亚。尽管受到殖民政府的严密监视，一部分共产主义地下组织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在东南亚进行秘密活动。中日矛盾的深化使得海外侨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组织在海外的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马来亚的共产主义组织积极参与了旨在声援国内抗战的爱国救亡运动，并在运动中获得了大量支持。在此背景下，马来亚共产党设立了许多或公开或地下的组织，在招募新成员的同时高举抗日大旗，积极地扩大其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③。正如马来西亚历史学家谢文庆所说，“马来亚共产党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一个面向中国及中共的海外华人政党，却试图在马来亚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中领导共产主义革命。”^④在马共近60年的斗争史中，这一矛盾在其创立之初即已显现，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调和。

四 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性”及“华人性”之间的矛盾

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国际主义特征，但东南亚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通常会在实践中选择与民族主义相结合^⑤。民族主义话语通常将争取独立与反对外国统治捆绑在一起，而共产党人则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反对外国资本家对本地人的剥削。其中，“异域性”（Foreignness）是一个微妙且充满争议的概念，对它的诠释很容易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左右。长期以来，对华人地位的争论是东南亚各地身

① Anna Belogurova,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of Nationalit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mintern,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1923 – 1939”,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9, No. 3, 2014, p. 446.

② “Tan Malaka on Communism in Malaya, 1925”, in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 October 1926, CO 273/535,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London, United Kingdom.

③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 – 1941*,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pp. 20 – 21.

④ Boon Kheng Cheah,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 – 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p. 40.

⑤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ambodia, 1930 – 197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x.

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居民一样，都是西方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但同时，一部分华人也因殖民统治得利，获得了相对优越的经济地位。因此，华人中既有殖民统治的反抗者，也有殖民秩序的拥护者。

东南亚本地人有两种抗拒“中国性”的表现形式。首先，在印尼和马来亚等多元社会中，华人是占据人口比例较高的少数民族。华人经常因在经济方面占有优势地位而被本地人视作剥削者。因此，反抗华人经济压迫自然地演变成了东南亚反殖民族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由于邻近的地理位置、频繁的人员往来，华人在越南和泰国等主要由单一民族构成的社会中也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对华人的反抗容易激发本地人参与反帝反殖运动的热情，使他们逐步形成对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形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对华人、“华人性”和“中国性”的种种反抗间存在着多种微妙的联系。通过与本地思想融合，共产主义能够适应不同情境下的政治需求，但各种族内及各族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导致在东南亚推进共产主义革命困难重重，造成了许多固有社会矛盾的激化。

1. 海外华人的困境

虽然中国革命对东南亚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对“中国模式”进行全盘接纳。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对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因为它证明马列主义在非欧洲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可行性。然而，许多当地人却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属于华人的”，并且难以接受“共产主义天堂其实是华人的天堂”^①。这种认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吸引力。

在荷属东印度，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对与华人建立合作关系一度非常犹豫。一方面，华人群体在经济上相对富裕，而且由于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一部分华人在意识形态上被共产主义所吸引，如果印尼共产党能够成功将其影响拓展至华社，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也担心与华人交往过密会动摇其群众基础，因为在本地人的刻板印象中，华人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从事投机、高利贷等令人憎恶的行业^②。

印尼共产党在1927年解体前与华人的工作关系并不紧密，两者间所进行的

^① Harry Benda,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Harry Benda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72, p. 61.

^②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25.

合作屈指可数^①。然而，印尼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华人排斥在其组织之外显然有违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非种族属性。除了考量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获得华裔群体的经费支持也是驱使印尼共产党与华人建立联系的重要动机。此外，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印尼华人报刊向来同情印尼革命，与华人媒体合作有利于促进其宣传工作^②。因此，印尼共产党尝试任命了一批华人执委作为其分支机构的代表，并招募华工加入其领导的工会。为体现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该组织还发起一些象征性的活动，帮助中国的赈灾事业进行募捐^③。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获得印尼华人的支持，但这一计划却很快落空了。许多华人认同中国革命，对参与激进的印尼革命缺乏积极性，极少加入印尼共运。随着荷兰殖民当局对左翼组织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华人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担忧大多选择不涉足本地人领导的激进运动^④。

与印尼情况相似，东南亚主要由华人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在突破种族界线招募成员，争取更为广泛的群众支持方面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如前文所述，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东南亚推动了一批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这些组织基于其骨干成员的种族背景，通常能在华人中建立起较好的群众基础，却很难吸引其他族群的民众加入。早期的马来亚共运便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马来亚华人与中国大陆关系密切，人员流动频繁，这些条件使得中共党员能够相对容易地潜入殖民地，并在当地迅速建立起新的党组织框架。然而，在完成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后，马来亚的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当地反殖运动互不相容的窘境：马共成员主要由华人组成，他们更关注中国的解放而非马来亚的独立。在此基础上，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使得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与此同时，马来人和印度人对民族解放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除了定义极为模糊的抗英运动，马来亚缺乏一个共同的、以实现民族团结为目标的思想基础。在马来亚这样一个族群相互隔离的多元社会中，华人占据绝对主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缺乏足够的

^① 1926年初，在莫斯科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曾多次谈到与印尼华人合作的重要性，但由于荷兰殖民的镇压，党组织陷于危机之中，这种合作从未有效开展。印尼共产党于1926—1927年领导的一系列失败的起义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其组织的崩溃。关于共产国际对印尼华人的讨论，参考 Alimin,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Indonesian Sub-Secretariat”, 29 July 1926, in PKI, AKPKI, Folder 2, ARCH01744, IISH.

^② Alimin,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Indonesian Sub-Secretariat”, 29 July 1926, in PKI, AKPKI, Folder 2, ARCH01744, IISH.

^③ “Report of Comrade Darsono to India Sub-Secretariat”, 6 May 1926, in PKI, AKPKI, Folder 2, ARCH01744, IISH.

^④ Ruth T. McVey,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26–229.

吸引力和粘合力。虽然马共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吸纳新成员来弥合这种民族分裂，但该党依然很难在其行动中把对中国与对马来亚的忠诚区分开来。直到1940年日本入侵前夕，一个名为“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All-Races Democratic United Front）的跨种族联盟才在马共的领导下成立，然而该组织并未对马来亚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环境带来任何实质的改变^①。

2.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国民身份重塑与东南亚共运的“去中国化”

反殖运动，以及广义的对外族统治的反抗往往可以找到其前殖民时代的思想根源。随着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殖民时代反抗外族入侵的传说被赋予了新的意涵，这种话语也因此和人们对民族解放的想象捆绑在了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这种想象对民族国家国民身份认同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因此，民族主义者经常把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斗争与前殖民话语中反抗外族入侵的话语糅合到一起。从历史上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是显著而持久的，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各地催生出带有反华传统的“爱国主义”。虽然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受到了中国革命的启发，但非共产主义势力依然对带有“华人性”的激进运动保持警惕。本地共产主义组织在学习借鉴中国革命经验的同时，也常常有意识地去弱化中国对其的影响。在泰国和越南两地，“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在抗拒“中国性”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去中国化”趋势也表现得尤为明显^③。

与马来亚类似，泰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华人。生活优渥的当地精英阶层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缺乏兴趣，共产主义主要是被移民群体而非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引入泰国的。此外，拥护君主制的保守派精英垄断了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话语，通过竖立以“泰族性”（Thainess）为中心的族群意识形态，以及对古老的泰族乌托邦（Thai utopia）的反社会主义想象，保守派知识分子得以对激进思潮进行有效的双重抵制。讽刺的是，泰国这种对左翼文化的抵制甚至

^① Boon Kheng Cheah, *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 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Documents and Discussion*, Ithaca: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2, p. 31.

^② Benedict R. O'G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pp. 9–36.

^③ 与精英主导的“官方民族主义”相反，安德森认为也存在由现代教育系统或印刷媒体等自下而上手段建构“民间民族主义”（vernacular nationalism）。亦可参见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ambodia, 1930–1975*,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xiv.

先于共运在当地的兴起^①。保守派拥有定义“泰族性”的特权，而“泰族性”是一种带有强烈本质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概念。其核心不是抵御殖民统治或邻国入侵，而是防范20世纪上半叶华人在当地不断增强的影响力^②。因此，具有强烈“华人性”的泰国共产主义运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是“非泰的”(non-Thai)。

然而，一群本地出生的泰国华人(Lookjin)逐渐弥合了外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泰国本土文化间的鸿沟^③。这些本地出生的泰国华人不仅将大量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著作翻译成了泰语，更重要的是，这些泰华共产党员在语言、职业、社会关系等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全盘泰化”^④。与马共相似，泰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也遇到了难以吸引到非华人成员的问题，但他们逐渐通过融入泰国本土文化系统的方式克服了这些困难。换言之，共产主义在泰国的本地化是通过“去中国化”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高举本土文化大旗的泰国改良共运得以在政府的严厉监控与镇压下生存下来^⑤。

越南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与泰国不同的“去中国化”过程。黄金庆认为，将越南革命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反殖斗争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是“爱国主义”(patriotism)。黄金庆所指的爱国主义不同于通常意义的民族主义，因为爱国主义带有在前殖民时代便已形成的强烈的民族自觉。这种爱国主义强调越南传统的社会秩序，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但带有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虽然“爱国主义”(tinh thần yêu nước)一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在越南语言中，但民族自觉早已植根于一种越南人所特有的、以“追求与中国不同政治命运”为核心内容的民族自豪感之中^⑥。因此，抗击中国的历史人物在越南的民族叙事中占有极为显赫的地位。“打败高高在上的中国人”是越南“爱国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⑦。

① Tejapira Kasian,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 - 1958*, 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 - 13.

② 泰国学者卡贤·特加皮让(Kasian Tejapira)认为，泰国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是种族主义(racism)，而是一套“民族化的话语”(ethnicizing discourse)。参见Tejapira Kasian,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 - 1958*, pp. 16, 189.

③ 泰语中Lookjin的字面意思是华人子女，不特别强调土生华人的概念。

④ Tejapira Kasian,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 - 1958*, pp. 24 - 25.

⑤ Tejapira Kasian, *Commodifying Marxism: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hai Radical Culture, 1927 - 1958*, p. 199.

⑥ “爱国主义”(tinh thần yêu nước)的字面意思是“爱国精神”。

⑦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7 - 28.

因此，“去中国化”意味着与革命的“中国模式”划清界限，这在越南反殖斗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划清界限的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受法国教育的知识分子与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士绅区隔开；二是把改革派与亲法国的合作派区隔开；三是把旅居中国南方的激进派和在殖民地成长的渐进派区隔开。随着越南反帝斗争变得越来越激进，年轻一代的革命者总能找到与所处环境相适应的新路径。例如，受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对中共进行全方位清剿的影响，在广东活动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解体，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重组。年轻党员批评老一代人缺乏革命精神，越南共运也因此出现分裂。随着身处中国的越共领导层逐渐式微，越南革命者中的年轻一代开始将党的政治重心从民族独立向欧洲式的阶级斗争转移^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重心的转移体现了越南共运由一个中国革命的衍生物渐渐转变为了一个完全自主运行的政治运动。“植根于本土的越南革命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一，因为它逐渐远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性’（communist monolithism）”，本达如是评论道，“显然，‘最好的’共产主义者不应是任何人的傀儡。”^②

小结与余论

通过比较泰国、英属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本文讨论了“中国”、“中国性”、“华人性”在东南亚早期共运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见图1）。

首先，中国革命为东南亚反帝斗争提供了天然的参考框架。为了反抗殖民主义，亚洲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接触并借鉴了共产主义理论。许多知识分子从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中得益，希望通过推动社会运动来实现民族解放。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思想得以在世界各地传播，也将亚洲反帝运动推向了高潮。中国是最早受到马列主义影响的国家之一，并较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应用于本地民族主义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列宁主义为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战略参考，对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殖民社会中推进反殖斗争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因此逐渐成为亚洲早期共运的标准形式。

^① Kim Khánh Huỳ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14 - 115.

^② Harry Benda, "Reflections on Asian communism",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66, p.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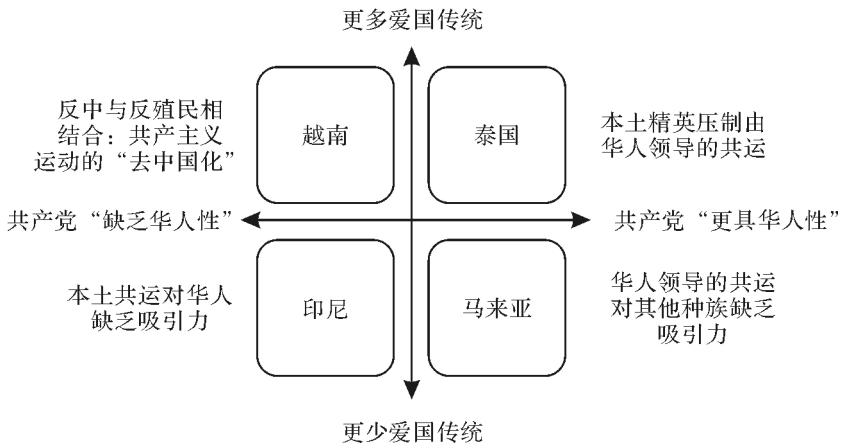


图1 战前印马越泰四地共产主义运动之“华人性”与“爱国传统”对比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其次, 中国是东南亚共产党人寻求革命思想启蒙的主要来源。作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非欧洲社会, 中国在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方面与东南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共产国际影响下, 中国革命在国共合作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对正在思考各自民族命运的东南亚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启发。在一些东南亚共产党人看来, 中国革命经验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共产主义进行本地化的信心。由于共产国际密切关注中国革命, 中国成为一个交流中枢和东南亚革命的策源地。东南亚共产党员频繁地访问共产国际设立在中国的办事处, 还有许多共运领导人长期在此类机构工作, 为东南亚共运起到了关键的纽带作用。为了赢得广大海外华人的支持, 一些受国民党或共产党影响的海外组织积极地在东南亚进行活动。然而, 这些团体往往很难在其组织的运动中突破殖民地的种族界线, 最终限制了其在当地影响力的发挥。

最后, 在东南亚语境中, “中国性”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 共产主义的兴起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海外华人特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 共产党人需要面对并处理因此产生的各种矛盾。一方面, 本地人领导的共运对接纳华人成员较为犹豫, 因为后者的资产阶级形象有可能动摇前者在工人和农民阶层中的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 华人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吸引非华人员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 因为由华人主导的共运通常充满了强烈的、以中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此外, 抵御中国影响力一直是东南亚“爱国传统”和官方民族主义话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泰国早期共运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华人性”, 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抵制在其所主导的泰国国族身份重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之相

对，一部分越南共产党员试图脱离革命的“中国模式”，此举不仅与越南革命的发展需求相一致，且符合越南自古以来以抗华斗争为表现的民族自觉和“爱国传统”。

本达曾指出，战后学术研究往往过分强调东南亚共运中的中国影响和革命的“中国模式”，部分原因是中共在1949年取得了内战的全面胜利，中国革命随即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①。经过几十年的变化，尽管本达的观察在当前背景下的适用性值得商榷，但“中国之影响”和“中国共运模式”的主题仍然与各种关于东南亚共运的学术讨论密切相关。

国际学术界在冷战时期对东南亚共运的研究主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讨论很少突破预设的地理及政治边界。虽然一部分学者进行过共运的比较研究，但此类著作却又常常以牺牲历史细节为代价^②。是否可以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题下对东南亚的早期共运进行比较研究呢？克里斯托弗·高夏（Christopher Goscha）对越南革命的东南亚网络进行的探索为这类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③。在高夏所提出的区域视角下，涉及“中国性”和“华人性”（而不仅仅是模糊的“中国影响”或“华人影响”）的相关话题还需要学者们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长期以来，学者们在东南亚共运、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海外华人研究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但一些重要问题仍待解答。例如，为什么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南亚的革命实践中经常被种族、宗教和文化间的仇恨所束缚？本地人与华人领导的共运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为什么两者未能进行有效的融合？东南亚在历史上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各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都在东南亚落地生根且和谐共生，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在一些地区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却在另一些地区受到异常强烈的冲击？东南亚共运史纷繁复杂且充满争议，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责任编辑：邓仕超】

^① Harry Benda,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Harry Benda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72, p. 59.

^② 此类研究包括 Justus M. van der Kroef, *Communism and South-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1; Colin Mackerras, *Marxism in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J. H. Brimmell, *Communism in South East Asia: A Polit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Frank N. Trager, *Marxism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③ Christopher E. Goscha, *Thailand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Network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1885 - 1954*,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Conceptualizing “Chineseness” in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 Movement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Indonesia , Malaya , Vietnam , and Thai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XIE Kankan

【Abstract】 Some Researchers often make convenient connection between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bu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se countries import communism from China is severely problematic. The issue of ethnicity , most acutely illustrated by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 was especially controversial in the rise of communism in the region.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the multi-facet nature of “Chineseness” in the sense of both China as the sourc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inspiration and Chinese as the agency for the spread of Marxist ideology. By us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ommunism as the basic frame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s in three colonial states , namely the Dutch East Indies , French Indochina , and British Malaya. As well as Thailand , has never fallen under formal European colonial domination. Instead of following events within fixe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r in a strict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analysis is structured thematically by focusing on three different yet interrelated angles: (1) anti-imperialism as a common course pursued by the colonial and semi-colonial East; (2) transplanting and modify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l; and (3)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hineseness in various forms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outheast Asia; Chineseness; Nationalism

【Author】 XIE Kankan , Assistant Professor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 China